

战后德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及其对社会变化的意义

王 涌

[摘 要] 战后两个德国经济发展都做到了与政治的同步,但是,之间又有着根本区别:一个以政治为先,经济为政治服务;一个以经济为先,政治只是起到辅助作用。后者由于没有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德国经济模式的关注。所谓德国经济模式有其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就是“市场+秩序”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方面有四个要素: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优势经济结构,以均衡为中心的企业治理模式,拥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注重创新、技术和质量。二德之间不同的经济道路和结果引发了不同的社会结果,使得各自拥有不尽相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最终,虽然联邦德国的经济和社会模式脱颖而出,但统一后遗症以及新的国家环境使统一后的德国迫不得已走上了一条与之前有所不同的经济道路,经济领域中的这个新变化立刻在社会结构方面引发了相应的嬗变。如何看待这些变化,这是当代德国研究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关键词] 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经济与政治同步;德国模式;社会结构

[作者简介] 王涌,华东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博士,上海 200136

[中图分类号] F151.6;K51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2728(2016)02- 0001-07

“德国资本主义社会在 1945 年前所经历的是一条不同于英、法、美的特殊的曲折的历史道路,其主要特点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呈现不同步协调发展状态,政治长期滞后于经济的发展。”^{〔1〕〔P54〕}二战结束后,消除这种不同步成了战胜国的共同目标。因此,战后德国虽然被人为地分成两个体制完全不同的国家,但是,经济发展开始与政治同步成了共有的特点。这种后建的同步使得联邦德国经济走过了一条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尽相同的道路,以致德国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引人瞩目。独特的经济道路自然引发着独特的社会变化。

一、经济与政治两种不同方式的同步

战后联邦德国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大体同步的观点,新千年时已在我国学界出现^{〔2〕〔P7-8〕}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是,民主德国经济也与政治发展高度同步却很少有人提及,对照这不同的同步不仅可以彰显政治与经济之间固有的张

力,而且还可以披露二德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

东德经济发展与政治的同步比较单一和直接,明显呈政治经济特点,即从政治需要出发去组织和实施一切经济活动。预先从政治立场出发制定一个目标,利用一切政治和行政手段,使所有经济活动围绕这个目标展开,即便事实上做不到,目标也不动摇。无论是五年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还是产业结构的建立,都由此目标而来。20 世纪 50 年代实践表明,该目标有问题时,东德对此还是不做调整。60 年代虽然出于经济因素考虑进行了一系列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但最终还是为不变的国家政治目标服务。70 年代中,这个改革之所以被中止,纯粹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担心改革走得太远,改变了国家的政治色彩。这样的同步不是从经济事实出发,而是从人为设定的目标出发,结果必然远离经济发展规律,进而最终背离目标。东德经济最终失败的根源就在于这种人为的同步,没有处理好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西德同样也出现了经济发展与政治的同步。同

比而言,这个同步并不单纯是建立了民主政治,更重要的在于确立了经济在先、政治为其服务的体制。战前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时期,由于市场经济支撑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完全与政治同步,与之对应的民主政治在德国并没有完全出现,战后西德做到了这一点,与市场经济对应的民主政治得以最终确立。这个同步是西德纳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去的体现,但它并没有简单地移植西方国家的做法,而是从自身的历史情境出发,建立了一个具有自身特点的经济与政治同步发展模式。因为此前魏玛共和时期自由主义导致的灾难使得战后德国的精英们清晰地看到,英美等国的自由主义经济道路并不适合德国。于是,他们推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东德的计划经济以高度中央集权和调控为特征,西德则相反,建国初期便在国家宪法,即基本法中与经济相关的第2、3、9、12、14条明确规定:国家在管理社会经济方面必须有其边界。国家的使命主要在于规定框架性的经济秩序并制衡和调控经济在社会层面引发的冲突。国家不应直接干预劳资冲突,但必须制定法律将劳资关系纳入一定的框架,并通过税收和社会政策实施再分配。这使得迄今西德经济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在规定框架性的经济秩序层面扮演着制衡与调控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放手市场,让市场活力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所谓的“市场+秩序”,就是在此意义上建构出来的。因此,经济与政治的同步在东德以政治完全干预为特点,在西德则是政治有限干预;东德将经济的社会问题放在首位,将其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西德则将经济放在首位,用基于经济发展的政治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

表面看,由于经济与政治同步的缘故,国家产业政策在两个德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结构调整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效果却截然相反。东德的产业政策由于以政治为先而严重脱离经济发展规律,效果消极;西德的产业政策由于以经济有效发展为本,高度尊重经济规律,效果明显积极。如此也就导致了积极的产业结构调整,同时也解决了产能过剩问题^[3](P33-34)]。战后两个德国此前工业基础相同,产业结构基本相似:机器制造业发达,产品出口比重高。但一个按照市场变化适时进行调整,一个由于政治干预错失了调整的良机。

事实表明,西德的经济与政治的同步获得了成功,这不单纯是因为其建立了西方式民主政治

和市场经济体制,更是因为其从自身历史情境出发,建立了更符合本国状况的社会市场经济。那就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目标,辅之以政治手段将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尽可能缩小,以保证经济最大限度地发展。战后西德经济腾飞,社会上和政治上的成就均与此相关。

简言之,战后西德经济与政治同步的关键在于平衡,通过秩序平衡经济与政治的需求。正像有学者所说:“联邦德国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以‘平衡’作为杠杆,强调‘秩序’和‘稳定’。”^[1](P15)]

二、德国经济模式的建立

西德以其出色的经济和政治成就,向全世界展现了不同于英美的另一种市场经济的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战前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向世界展现了一条与英美等其他西方国家不尽相同的道路:由魏玛时期政治落后的自由经济到第三帝国时期的国家政治经济。西德在此基础上走上一条兼顾市场活力与社会均衡的经济发展道路。由此,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有关德国经济模式的话语。

总体而言,这个模式的要点就是兼顾市场与均衡,所谓“市场+秩序”。一方面,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奉行市场经济,推行自由竞争;另一方面,又看到自由竞争有其反社会性的一面,主张国家干预,将自由竞争可能导致的负面效应降至最低。于是,由国家出面,一者对经济活动建立框架秩序,遏制其负面因素的出现;二者通过再分配直接扶植和支持自由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这样的兼顾体制赢得了社会上上下下的广泛支持,以致国家干预没有成为对市场活力的遏制,反而成了自由竞争的保障。西德经济模式的成功就在于,将市场经济建设成了一个包含社会、精神和伦理要素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不仅自由竞争没有成为野蛮竞争,而且社会政策也与市场经济取得了一致。

具体而言,这个德国模式有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就政治层面而言,就是建立了“市场+计划”的混合经济体制。计划是有明确限度的国家干预,即在框架层面规定经济活动的秩序。而且这个干预的目的是使国民经济更加有效地发展,如建国初期国家为刺激经济,用货币政策手段将企业的资金状况控制在较低水平,以迫使企业加速将产品推向市场而不是囤积;然后,又对加班工资采取零税收政策。这样,不仅激活了经济,也使价格呈

总体下降趋势,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最终,消费者的作用迅速出现,所谓买方市场出现,市场经济活力得到了激发。西德就是如此在国家政策干预下启动了市场经济之路。同样,在社会政策方面国家干预也始终以市场经济为本,如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半岛危机在西德导致囤积性采购时,价格上升,进口也开始上升。一时,主张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者要求随着价格上升而同步性地加工资。当时政府采用的并不是这种伤害市场经济的过度干预,而是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抽回流通资金,提升最低储备金额,限制再贴现,将贴现率从4%提高至6%,将抵押贷款率从5%提高至7%。1951年第2季度出现了转折,出口开始超过进口。供需关系的改善使价格上升得到了遏制。由此坚持了市场经济的原则:通过生产率提高而不是国家补贴来增加工资。50年代末在经济经过了第一轮飞速增长后,国家有了经济基础,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出台。60年代经历了第二轮经济高速增长后,稳定经济的政策出现,主要目的在于满足扩大社会建设的期待,用经济连续高速增长而来的收益去扩充社会福利建设,进而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70年代中,当持续的国家调控影响到经济发展时,这个调控随即放缓。随之,经济又开始出现增长。70年代末,社民党政府又开始加大社会福利,使国家消费越过了经济承受力,80年代初经济又出现衰退,1982年新政府上台后,立刻为经济发展松绑,调整过度的社会福利,经济又开始出现好转,直到80年代末二德统一。由于统一本身主要是一个政治行为,而且以经济上的某种牺牲为条件,因此,统一后的德国先是不得不加大国家行为,尽可能加快东西部一体化进程。当这样的国家调控开始影响经济发展时,新千年以后,天平又开始滑向经济发展。战后联邦德国经济发展就这样清晰地由均衡显出其特征,在国家干预和市场活力间取得均衡,使其互为手段,互相受益。70年代德国以外地区掀起的德国模式讨论中之所以将焦点放在德国社会拥有着广泛的一致上,就是由这种均衡而来;均衡社会不同群体的需求。

德国经济模式还有其经济层面。19世纪后起的德国工业化道路从一开始就明显与英法不同,它是靠进口最新技术,如引进当时最新、最具发展推动力的铁路建造、钢铁冶炼、煤矿开采和机械制造等来形成重点,由大银行来实施工业贷款。自1870年开始又出现了知识密集的化学和电子工业。这

些重点尤其能催发经济增长率^{[4](P25)}。当时德国虽然在生产方式上还明显落后,但这些重点给德国带来了高增长,同时也奠定了德国经济发展的初步结构:经济上的高增长率与政治上的落后状态并行。20世纪直到1914年的工业化飞速发展中重工业、化工、电子工业和银行业还是中心,并形成大企业和垄断。由此凸显出一些德国特有的经济要素,但是,德国特有的生产体制还没有得到充分展现。一战爆发使正在形成的德国经济模式中断,魏玛时期和第三帝国在生产体制上并没有与此前传统承接。直到二战结束,西德经济发展接上了这股“地气”,使19世纪处于形成中的经济模式走向完善。

就战后走向完善的德国经济模式而言,经济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优势经济结构。19世纪德国工业化的成功开始得益于发展优势经济领域,当时是铁路建造、钢铁冶炼、煤矿开采、机械制造、化工、电子工业。战后西德经济继续构建优势经济结构的理念,机械制造、化工和电子工业成了其三大经济支柱和优势领域。最初,煤矿开采还得到了政府的扶植,后来由于新能源的出现,煤矿开采不再成为西德的优势发展产业。这样,西德在这些优势领域中就具有了很高的出口份额,以致整个国民经济很大程度以出口为驱动。由于看重优势经济结构,随着时代变化,经济结构的适时调整也成了西德经济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如适时对煤炭工业的放弃和对第三产业的扶植。即便对新兴产业的扶植,西德也结合自己国情的实际,而没有强行违背客观给定,如20世纪70年代面对全球范围内的第三产业化趋势,西德并没有简单放弃原先具有优势的第二产业,而是在第二产业的基础上推进第三产业。正如国内学者所说:“由于德国第三产业主要是依附第二产业出现的服务业,所以,不管是战后,还是随着德国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第二产业带动型的产业结构模式将是德国一直的选择。”^{[3](P32-33)}此外,西德在绿色经济、新能源、风能、太阳能、节能技术等方面创造的新商机也是全球范围内独具特色的。

其次,以均衡为中心的企业治理模式。较之于英美法意日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西德经济发展中的企业治理模式也独具特色,做到了兼顾各方利益,尤其是劳资双方的利益。企业并不绝对以利润为中心,而是看重劳资关系的协调。员工工资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相一致,这就使得工资提升与企业效率一致,而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劳动力成

本的上升超过了企业生产效率。这不仅建立了良好的劳资关系,而且也使德国经济更加具有竞争力。

再次,拥有高素质的劳动力。“高素质”并不意味着绝对的知识技能至上,而是相对于劳动需求而言,这与西德的教育相关。20世纪60年代分层教育体制的出现给经济发展提供了各层面的高素质劳动力。

最后,注重创新、技术和质量。产品质量一直是以出口为主导的西德经济普遍看重的,恰是质量使战后德国经济出现了奇迹。其间,注重技术和创新是关键。正是基于此,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是西德经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些企业虽小,但大多拥有着某一领域世界领先的技术。

战后西德经济的成功将19世纪已初见雏型的德国经济模式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中断后,推向了完成。这个模式的两个核心要素是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us)和各方协调(Korporatismus)。德国经济在19世纪启动伊始就在推行自由竞争的同时又强调秩序。操作上则怀着全球视野看重强势经济领域和优势经济结构的建设,结果就是技术和质量领先,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这个经济模式在战前已初见成效,战后则将其蕴含的能量有效地释放出来。

三、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果

两个德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道路和结果,自然引发了不同的社会变化。总体而言,东德出现了一个基本不受经济因素影响而主要由人为因素导致的阶层社会,社会形态上与传统出现了断层;西德出现了一个主要由经济因素支撑起的调和的阶级社会,社会形态上虽不同于传统,但没有出现裂痕。

首先,东德由于经济体制上人为选择了一个与自身传统较少有挂靠,而与外来的苏联有着清晰衔接的体制,一开始就引发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德的社会结果:大量人口移民西部。二战刚结束的头几年里,东西部是没有人口边界的,人员可以自由流动。东部地区由于奉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使得很多人选择了西部作为其居住地。主要是被驱赶者(Vertriebene)和难民两类人。前者主要来自西里西亚和苏台德地区。二战结束时,这两个地区的德国人愿意加入波兰或捷克籍的可以留下,否则必须返回德国。当时,大部分人选择离开,而且千里迢迢到达东占区,结果由于经济体制的缘故没有留下,又继续西行,来到了西占区;后者指

主动逃离东部地区而前往西部的东德人。之后,这股移民西德的潮流一直没有停止过,直到柏林墙建起,才明显好转。据统计,1949-1990年间总共有460万人跑到西德,这个数字约相当于民主德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一开始由经济体制引发的社会人口变化后来又由经济发展的实际失败得到了加剧,这使得东德自始至终成为一个人口移出国,而且到20世纪80年代末成为地球上唯一一个人口总数没有增长的国家。这使东德经济发展缺失了必要的劳动力基础。

其次,东德的计划经济使一个全新的社会在德国历史上开始出现:一个废除私有制,经济上全社会基本平等的阶层社会。本来,私有制是战前德国经济和社会传统中的一个基本要素。计划经济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差别基本抹平,没有了私有制,人之间的经济收入开始趋同,不管经济如何发展,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演变不再有直接影响。这时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主要由政治因素左右。工资收入这一块基本趋同,使人显出差异的已不再是工资收入和占有的财产,而是政治地位,并进而由政治地位间接获得对财富的支配。这就使东德出现了一个没有阶级但有阶层差别的社会。阶级来自经济上的直接占有,阶层来自不同权利和社会地位。东德的阶层差别主要由党员、干部、“新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业主组成。各阶层之间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而只有权力和地位的不同。这个不同主要来自政治而不是经济因素。这就使东德的社会结构呈现出稳定性,同时也是封闭性。

再次,东德与经济发展脱节、与政治因素挂钩的社会结构,使得德国经济传统中的成就优先原则(Leistungsprinzip)渐渐退场,晋升优先原则(Aufstiegsprinzip)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就优先意味着,一切以做出的成就作为评判的依据;晋升优先意味着,一切以位置高低作为评判的依据,至于实际能力以及做出的成就则是次要的。因此,晋升成了生活中唯一追求的目标。这直接导致劳动力质量低下,生产率发展缓慢。

最后,福利至上也是东德计划经济体制引发的一个必然结果。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差别被抹平,社会生活必需的一些经济支出便由国家出面解决。如物价补贴、全民免费医疗、零失业率、福利分房、公费教育等,在大型国营企业除了建立免费幼儿园和医疗室外,还设有免费食堂和生活用品修理处等。这些成了东德较之于西德特有的社

会方面。这些福利不管国家有没有经济能力,都必须存在,哪怕没有经济能力,贷款借钱也必须维持。20世纪70年代后东德的社会政策就呈现出这种情况。一方面经济越来越不景气;另一方面国家福利,尤其是住房建设,却在不断扩大。老百姓不知道的是,这些福利全靠国家举债得以维持。

西德的经济发展由于完全不同的体制和道路,引发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变化。首先,一开始由于选择的经济体制明显保留了传统的一些要素,如私有制、成就优先、秩序自由主义等,很快吸引了—个庞大和优秀的劳动大军。除了自身原有的人力资源外,战后大量人力涌进,尤其是那些高素质的劳动者,使得西德的经济发展从一开始就有—个良好的社会基础。据不完全统计,在战后的四五十年代,有1200万人进入西德,这些人中除了来自西里西亚和苏台德地区的被驱赶者和来自东德地区的难民外,还包括大量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外来劳工,如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国的劳工。这些外来移民中不少受过良好教育或掌握—门工作技能。此后,西德经济发展中,由于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出生率逐年下降,由此滋生了持续的缺少人力状态,尤其在50—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这使得外来移民成了经济发展引发的—个持续现象。

其次,西德经济发展引发的社会结果尤其是集中在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变化以及由此变化而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如贫富差异、失业率、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等。战后经济飞速发展,自然引发社会剧烈变化,最典型的就是贫富差异分化。但是,由于从一开始就奉行协调各方利益的原则,这种分化被限定在良性范围内,也就是说,两极分化没有发展到很大的地步,其典型体现就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洋葱形”社会结构开始出现。20世纪60年代社会经过两轮经济飞速发展后,较之于战前,位于社会顶层和最底层的人口并没有增大,而是由持平转向缩小,尤其是社会底层人口随着经济发展明显出现缩小的现象。结果不但是贫富差异没有预想的那么大,而是某种程度上在变小,而且庞大的社会中层开始出现,这使社会稳定出现了—个新的保障,即不是来自政治而是经济因素的保障。作为社会主体的庞大中层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定经济能力,他们不仅作为主导性消费群体拉动经济发展,为社会安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而且也使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社会过渡到利益可调和的阶级社会。—

方面经济发展使原来社会底层人员有了较好的基本经济保障;另—方面协调各方利益的企业管理体制使得劳资冲突不至于发展到灼热化地步。由此,社会稳定以新的机制出现。当然,由于市场经济的缘故,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失业率,而且—度达到两位数。西德—直采取着治本治末双管齐下的措施。治本即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以使更多岗位出现,治末即国家福利。就前者而言,西德深入问题本源,在公共教育方面进行了—系列改革,保证经济发展能够获得所需和高质量的劳动力。然而,经济发展引发的社会负面效应方面虽然有了如此的解决,但是,同样由经济发展引发的大量外来移民却成了西德经济发展导致的—个重要社会问题。如果说,贫富差异在原有德国公民间没有出现增大、反而出现缩小的局面,那么,贫富差异在外来移民间是存在着明显差异的,这使得西德贫富差异最明显地存在于德国人与外来移民间。对此,政府长期以来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大约自世纪交替以来,随着外来移民力量的壮大,政府才开始正视这—问题,但迄今都没有很好解决。

再次,西德经济由于是在均衡各方利益的框架下发展成长,其引发的社会变化也具有明显的协调主义色彩。从大的方面来说,协调经济与政治间的张力,协调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从小的方面来说,协调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果往往是政治家们首要关心的问题,由于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缘故,—方面政治家们无法将社会效果凌驾于经济之上,再怎么关注也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另—方面,社会市场经济框架下出现的企业协调管理机制又使经济发展肩负起了—定的社会责任。这就使得经济发展与政治企求之间建起了协调,而且以经济发展为本,政治企求为辅。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不仅使国家避免了违背经济规律的社会建设,而且也使社会建设服务于经济发展。如就业问题上,基于市场原则政府没有用行政手段控制失业率,而是积极从大小两个方面入手,努力将失业率降至最低。大的方面,积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使得全民教育输送的劳动力更加紧密地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运用政策手段鼓励企业积极创造新的劳动岗位等。小的方面,以再分配为手段适时进行社会福利建设,以使失业问题不至于影响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等。即便在政治本身也相应出现了各方力量的协调机制,如基民盟/社民盟与社民党两大政党之间以及分别与自民党之间的协调,后来又出现分别

与绿党之间的协调。社民党的社会基础本来是庞大的工人,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引发的社会变化,不少工人不再位于社会底层而是进入中层,该党的支持者转而变成知识分子。这就表明,党派之间的均衡与协调成了战后西德根深蒂固的共识。联邦制的出现使中央与地方建立起了良好的制衡与协调关系,这也很好映现了西德协调各方利益的发展框架。

最后,社会价值观方面。战后经济腾飞使得个人生活与自己的劳动紧密相关,这让传统的成就优先原则被广泛接受,社会个体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付出多少得到多少的思想深入人心。这不仅使经济发展有了高质量的劳动力,而且也给国家福利建设减少了不少压力。与此同时,社会出现了明显的政治为经济服务的趋向,公共生活领域甚至出现了非政治化趋势。生活方式上,传统大家庭开始消亡,大部分人生活在所谓的核心家庭中,1950年时西德就有大约60%左右的人生活在不完全家庭中^{[5](P323)}。随之,单亲、单身家庭开始增多。

四、最新出现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初科尔政府在社会福利建设过度,失落实际经济支撑的情况下上台,因而促进经济发展、降低失业率成了首要任务。80年代末经济出现明显好转后,由两德统一而来的后遗症又使本已开始好转的德国经济陷入困境,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家福利负担沉重。恰在统一后不久,政治上开始重新强大的德国又力推欧盟出现,之后又建立欧元区。这时,经济发展的国家环境已经与50-60年代大不一样,90年代振兴经济举步维艰。90年代末科尔下台后,不理想的经济的发展使新上台的施罗德政府必须将降低失业率作为首要任务,而且必须靠经济发展本身的机制而不能盲目依靠国家开支。于是,德国启动了劳动力市场改革,从劳动者角度入手,迫使他们积极就业。新千年以来,尤其是接替施罗德政府的默克尔政府后,德国出现了就业奇迹,尤其是2008年欧债危机以来,德国出现了不断创历史新高的就业率,那是施罗德政府推进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即哈茨改革出现的效应^{[6](P3-4)}。哈茨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从严厉国家福利角度迫使劳动者积极就业。新近出现的高就业还有来自雇主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国家允许的低工资政策。正如国内学者指出的,对于新近

出现的高就业“学界普遍的共识是:2003-2005年推行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哈茨改革)扩大了德国的就业面,德国的就业奇迹也得益于这一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长期以就业为导向的低增长工资政策则是2005年后德国失业率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始终维持低位的单位劳动成本使德国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7](P101)}。“对劳动力市场内部弹性的运用以及长期实施以就业为导向紧缩的工资政策是德国实现‘就业奇迹’的根本原因。”^{[7](P110)}内部弹性就是迫使那些本来可以就业,由于高福利缘故主动失业的人积极就业。默克尔上台之后一直持续了这些政策,最终,失业率降低,就业奇迹出现。

由此推进的高就业率虽然减轻了政府负担,但明显是以贫困的扩大为代价。2006年时德国在低工资部门从业人员占有所有从业人员的比例是18.7%,2010年时上升到20.6%^{[7](P110)},这样的贫困化也使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德国柏林世界经济研究所新近发布公报:2010年来德国中产阶级萎缩,穷人和富人群体人数有所增加,出现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趋势。依据的数据是:2009年时,人均月净收入介于860欧元和1844欧元的德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61.5%,2000年时这一比例为66.5%。同时,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分别从2000年的17.8%和15.6%上升到2009年的21.7%和16.8%。此外,低收入者的月平均净收入也从2000年的680欧元降低到2008年的645欧元;高收入者的月平均净收入则从2400欧元上升到2700欧元^{[6](P4)}。这样的发展对于减轻政府福利开支和缓解德国债务状况,自然是好事。但是,这明显失去了二德统一前联邦德国经济和社会得以良性发展所凭依的协调主义原则。失去了这个平衡,原有与经济发展同步的社会稳定就会受到威胁。正是鉴于此,德国左派政治家开始呼吁国家制定法律,限定最低工资。

当然,德国这样做并不是要刻意改变原来的协调主义原则,而是为新形势所迫。一方面,二德统一以来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严重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原有的协调主义手段在新形势下遇到了困境,欧盟与欧元区的建立使原有宏观调控中的政策和货币手段不再有效。于是,便从劳动力市场开刀,迫使劳动者作出让步。这又与国内外劳资关系中天平开始向资方倾斜有关。国内经济发展导致的庞大中层使相当一部分工人的地位发生变化,加上长期的协调主义做法,使得德国资

方不断占据有利地位;国外苏东解体,冷战结束,资本主义这一方越来越赢得话语权。

本来,全世界范围内 20 世纪 70 年代末出现的产业转型(第三产业化)就已经使工人阶级队伍萎缩,全球开始出现“不关注劳工利益需求”,“砍伐福利,打击工会”的潮流^[8](P140-141)],同时开始了“一个从税收、利率、贷款等各方面优待资本的时代”^[8](P141)]。当时“德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在 70 年代后期也发生了社会转型,社会阶级结构同样出现了工人阶级队伍日渐萎缩的结果”^[8](P141)]。但是,当时德国由于协调主义的缘故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出现优待资本的情况。就此类推“德国模式中高福利,雇员参与公决制度所依存的政治基础和阶级基础产生了动摇”^[8](P141)],是言过其实的。70 年代,随着第三产业化进程,德国虽然也出现了工人队伍萎缩的趋势,但资本家还是受到社会价值方面的约束,工会并没有怎样被打压。工人阶级队伍虽然萎缩了,但工会的作用没有变化,工会成了所有雇员的代言者,80 年代以来,雇员参与公决制在德国并没有怎样受影响。如果说德国有优待资本的情况出现,那也是二德统一后的事,而且主要原因并不是工人队伍的萎缩,而是经济发展无力所致。统一后向东部地区移植西德经济模式,预期的经济奇迹不但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下滑,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就是其症结。按照传统思路,要解决这一问题自然是宏观调控。但是,情况与以前不同了,欧盟在财政方面的框架规定使德国政府不能只从民族经济角度行事。同时,欧元区的建立使得德国难以控制资本流动。这些干预手段的受限迫使政府寻找新的出路。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要为经济服务的一些理念以及进入新千年前后国际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使得德国政治家,尤其是社民党这样的左翼政治家开始改革,提出建立有差别的平等。用曾任德国社民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的托马斯·迈尔的话来说,所谓“有差别的平等意味着保证最大可能程度的自由,承认个人的自我发展权利,而对社会一体化不会造成威胁的一切个人差别,都是合法的并且应给予鼓励”^[9](P164)]。这样的“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开启了一系列指向雇工方的改革,范围涉及税收、劳动保护、养老、医疗等。核心内容就是为资方减负,鼓励就业。默克尔上台后推行的所谓“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沿袭施罗德政府的一些改革举措。所谓“新”主要

是在促进就业方面采取了一些鼓励青年和 50 岁以上人员就业的举措,2008 年起企业税由 38% 降到 30% 以下,最高收入税从 42% 提高到 45% 等。这些举措表面看似温和,但总体还是倾向资方和富人这一方的。

因此,德国新近之所以宁可以贫富差异扩大为代价去提升就业率,主要原因不是受国际形势所迫而刻意倾向资本这一方,而是为统一后自己陷入的困境所迫在寻找出路。本来,二德统一后 20 世纪 90 年代里已经出现了社会贫困化的趋势,如申请救济金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明显上升,但政府为了治本,为了提升就业率,还是冒着扩大社会贫困化的风险,采取了如上所述倾向资本这一方的措施。这些举措表面上破了此前协调各方利益的一贯做法,但最终依托着战后一直被广泛接受的经济优先原则,因此,新近以贫富差异扩大为代价的高就业率才会出现。高就业当然是好事,但这样人为创造就业岗位的做法是否最终有益于经济发展? 还有,如此伤害了协调发展原则是否会最终影响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这些问题都是有待进一步澄清的。

[参考文献]

- [1] 吴友法.德国史探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2] 吴友法,黄正柏.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 [3] 刘永焕.德国产业结构调整及其经验借鉴[J].对外经贸实务,2014,(1).
- [4]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 Cambridge: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 [5] Werner Abelshauser.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seit 1945[M].München:Beck,2004.
- [6] 郑春荣,李乐曾.德国发展报告(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7] 朱宇方.解读“德国就业奇迹”[A].郑春荣,李乐曾.德国发展报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8] 王友明.跨越世纪的德国模式[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 [9] 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M].殷叙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邵川桂]